



(← 上接第B2版)

四、从民族性、阶级性向人性突破

写完“射雕”三部曲，金庸的面前已经没有了路。

从来没有写武侠小说的人到过这里。他已经走得最远了，前方却仍是荆棘，仍然要艰难前行。

于是，从1963到1972年，金庸又给出了我们所谓的“三杰作”，就是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笑傲江湖》和《鹿鼎记》。

他的笔开始书写悲悯，刻画荒诞，呼唤自由。

用卢敦基《金庸小说研究》里的话说，金庸的小说开始“从民族性、阶级性向人性突破”。要知道，家国情怀是没有深度的，有深度的乃是人性。近现代文学史上，没有一部伟大经典是纯以家国情怀为主旨的，就算能短暂昙花一现，也必然是速朽的。

这里讲一讲《笑傲江湖》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诗，曾经在国内非常流行，就是：

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

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

这一首诗完全就是金庸《笑傲江湖》的主题诗。它的主人公令狐冲就恰恰遇到了诗歌里的困惑：“要爱情，还是要自由？”

书上有这样一个情节：令狐冲希望能和任大小姐在一起，结成眷属。但老丈人任我行的条件很明确：要娶我女儿就必须加入日月神教。为了爱情，牺牲自由，行不行？令狐冲的最终决定是不行。

因为日月神教禁锢人性，剥夺人的尊严，制造谎言和虚伪。“圣教主千秋万载、一统江湖”的话，他说不出口。天天跪拜磕头、违心拍马，他做不到。

令狐冲说：“她（任盈盈）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，我原非顺她之意不

可……可是要我学这些人的样，岂不是枉自为人？”“甚么‘中兴圣教，泽被苍生’，甚么‘文成武德，仁义英明’，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，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。”

令狐冲就是“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”的典型。

金庸的创作，前期的主题是关注“生命权”，让弱者不被屠戮和损害；后期的主题则悄然变成了“生命的状态”，不只是活着，而且要活得舒展和高贵。

五、推崇金庸不需要用《水浒》、大仲马等壮胆

令狐冲曾经有过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。有一次，在恒山悬空寺，少林方丈问令狐冲：为什么左冷禅（野心家）恨你？

令狐冲说：因为晚辈总是阻挠他的大计。

方丈追问：你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？

令狐冲呆住了，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。用书上的话说就是：

令狐冲一呆，一时难以回答，顺口重复了一句：“我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？”

左冷禅的“大计”，乃是要合并分散的五岳剑派，统而御之。这听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对。何况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，“合并”、“统一”往往代表着正确，代表着积极和进步；而“分散”则往往代表着倒退、混乱、破坏和无秩序。那么令狐冲为什么要破坏左冷禅的大计？

之前金庸的那些主人公，不管是义薄云天的郭靖，冷傲偏激的杨过，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，豪迈过人的乔峰，都有着明确的人生使命，做事情都有着充分的理由。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斗。

例如郭靖就曾当面回答过忽必烈的疑问：郭叔父为什么死守襄阳？答案是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。他说“郭某一腔热血，是为神州千万百姓而洒。”

而换了爱情至上的杨过，他又是什么而抗争呢？多数时候是为了和姑姑在一起。

可等到了令狐冲唱主角时，此公居然糊里糊涂，似乎全然不知自己为什么而战斗。面对方丈大师的问题，他思索了半天，最后回答的大意是：左盟主让我感觉不好。我就是反感他。

事实上，令狐冲说不出的答案恰恰就在书名里，是为了“笑傲江湖”。注意，“笑傲”的意思不是制霸，而是潇洒如意、随心所欲。如同这个词的出处之一的《西游记》中一首词所说，渔夫打了鱼，“得来烹煮味偏浓，笑傲江湖打哄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令狐冲是本能地厌恶左冷禅。他本能地察觉到了这种“大计”的代价，那就是人人都会被压抑、被胁迫，个性不能舒展，不能“笑傲江湖”。他对此无法接受，就像他曾有言：“我不愿做的事，便是师父、师娘、五岳盟主、皇帝老子，谁也无法勉强。”令狐冲所捍卫的，乃是一种更高贵的生存状态。

《笑傲江湖》是金庸的倒数第二部书。到这时，金庸不过四十五岁，年方壮盛，但已经进入了创作的最后一个阶段。

他已抬脚迈过了一道门槛，向着文学更终极的目的挺进。他的小说的内涵已经超出了《水浒》或者是大仲马的笼盖，早已不是单纯的“侠义”和“人道”。所以像卢敦基所说，推崇金庸并不需要用《水浒》来壮胆。

至于《鹿鼎记》，这个留着，以后再写。

六、一流杰作，上上人物

最后给金庸的文学成就一个评语。

有人说，金庸之所以了不起，是因为他提倡“侠义”；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小说里有很丰富的“古典文化”；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写的武功超神奇、超有想象力。

其实用文学的至高标准来看，这些都是末节，不足以标刻他在文学上的最高高度。

金庸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，我认为是他不但塑造了一大批一流的文学人物，而且居然用武侠小说这种超级不严肃的东西，进行了最庄严的文学探讨，开展了触及人类灵魂的叩问。而在这种叩问之中，竟然还穿插着神奇瑰丽的想象世界，风光旖旎的爱情，热血激昂的侠义精神。

对他的小说，我也是渐渐地才领会到更多的。

比如后来回头看金庸，才猛然发现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，最及时、最深刻地揭示和批判某个特定时代现实的作品，居然是金庸；多年以来我们有伤痕写作，有农民写作，有痞子写作，却没有士大夫写作。而金庸是士大夫写作；我们的作家常常是脏兮兮的、土了吧唧的、或者是吊儿郎当的，而金庸是士大夫般昂藏的。

金庸的作品，至少有三到四部，是文学史上一流的杰作。金庸是文学殿堂里的上上人物。

当然了，布鲁姆说：“经典性需要作家去世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证实”，所以以后由孙子们去讨论这些才最科学。反正他本人是早已经走了，像杜甫讲的：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